

# 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抑郁、亲子沟通的作用

■ 张 卫 王华华 喻承甫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631;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本文采用问卷法对966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考察青少年网络受欺凌与其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的关系,以及抑郁和亲子沟通在其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抑郁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亲子沟通显著调节中介路径“网络受欺凌→抑郁→NSSI”,具体而言,网络受欺凌通过增加抑郁进而增加NSSI风险的中介效应,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显著强于高亲子沟通青少年。上述结果表明,网络受欺凌、抑郁是青少年NSSI的风险因素,而亲子沟通是有助于缓冲这一风险效应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青少年 网络受欺凌 抑郁 非自杀性自伤 亲子沟通

## 一、问题提出

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以下简称NSSI)是指没有自杀目的、有意及直接伤害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sup>[1]</sup>。一般来说,青春期是NSSI的始发期,也是NSSI的高发期。近期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在2021年上半年的NSSI流行率约为15%<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NSSI与学业困难、身心健康问题显著关联,是自杀的重要风险预测因子<sup>[3]</sup>。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受欺凌(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在青少年群体中日益普遍。不少实证研究反复证明,网络受欺凌是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风险预测因素<sup>[4]</sup>。可见,网络受欺凌、NSSI都是青少年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生活实际问题。鉴于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NSSI的显著风险预测效应,本研究选取二者作为研究主题,拟探究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以期为开发青少年NSSI的预防与干预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持。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一)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是指个体或群体故意采用涉及电子技术的信息和通信,发送或张

收稿日期:2021-07-20

作者简介:张 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心理健康教育;  
王华华,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与教育;

喻承甫,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青少年问题与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感觉寻求与青少年问题行为:行为遗传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课题编号:316711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贴让人难受的文字和/或图片,用以对另一个体或团体进行蓄意的、反复的骚扰或威胁<sup>[5]</sup>。依据NSSI的人际关系模型(The Interpersonal Model of NSSI),遭受社会排斥、网络欺凌等不良人际压力事件的个体,可能会采用NSSI作为缓解压力或紧张、逃避痛苦和压力源的应对策略<sup>[6]</sup>。不少实证研究也反复表明,网络受欺凌是青少年NSSI的重要风险因素。如Yu等人的研究发现,网络受欺凌会减少青少年的对学校活动的参与,进而增加其NSSI风险<sup>[7]</sup>。与之相似,Zhu等人对1987名中国青少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研究,发现网络受欺凌会增加青少年的焦虑症状,进而增加其NSSI风险<sup>[8]</sup>。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强调了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NSSI风险。

## (二)抑郁的中介作用

尽管不少研究证实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NSSI风险,然而,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中介机制尚不明确。多重不利模型(The Multiple Disadvantage Model)指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处境不利会增加抑郁等心理疾病,进而导致非适应性应对行为<sup>[9]</sup>。依据此理论,本研究认为,抑郁可能是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

一方面,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较多的抑郁症状。遭受网络上蓄意和反复骚扰的青少年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消极的看法,认为自己是有缺陷的<sup>[10]</sup>。此外,与线下传统的欺凌行为相比,网络欺凌存在匿名性、无时空限制性等特点,这会使网络欺凌受害者遭到更强烈、更持续的打击,从而容易引发抑郁症状。实证研究也发现,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增加青少年抑郁。如Chu等人以489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对象,结果发现网络受欺凌与受害青少年的抑郁显著正相关<sup>[11]</sup>。类似地,Liu等人通过对661名中国青少年进行为期八个月的纵向追踪研究,结果发现网络受欺凌可以前瞻性地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sup>[12]</sup>。

另一方面,经历重度抑郁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出更多的NSSI。依据体验回避模型(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人们往往会采取行动(如NSSI)来应对抑郁、痛苦等负面情绪体验<sup>[13]</sup>。Marshall等人对506名青少年进行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抑郁显著预测其NSSI风险<sup>[14]</sup>。此外,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消极情绪是欺凌受害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如Baiden等人以1650名12—18岁青少年为被试对象,通过研究发现,抑郁显著中介欺凌受害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sup>[15]</sup>。类似地,Zhu等人(2021)研究发现,焦虑症状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sup>[16]</sup>。因此,本研究有理由相信抑郁可能是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因此,提出研究假设1:抑郁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

## (三)亲子沟通的调节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都会出现NSSI。依据风险—缓冲假说(Risk—Buffer Hypothesis),作为促进家庭系统得以良好动态循环的重要保障的亲子沟通,可能是缓冲/削弱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抑郁、NSSI的不利影响的重要保护性因素<sup>[17]</sup>。研究表明,亲子沟通是青少年NSSI的重要保护性因素<sup>[18]</sup>。此外,研究也表明,良好的沟通能显著缓冲/削弱压力事件对青少年自伤行为、抑郁等的不利影响。亲子沟通有助于促进社会支持,而Wang和Liu以431名留守儿童为被试,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显著缓冲/削弱同伴侵害对NSSI的风险效应<sup>[19]</sup>。亲子沟通促进了青少年获得父母的指导,进而有利于改善同伴关系,促进同伴沟通。Hilt等人以94名10—14岁女生为被试对象,研究发现,同伴沟通显著调节同伴侵害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即同伴侵害只会增加低沟通青少年的NSSI,而不会增加高沟通青少年的NSSI<sup>[20]</sup>。此外,Özdemir以337名15至18岁青少年为被试,研究发现,亲子沟通能显著缓冲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自尊的风险效应;具体而言,高亲子沟通青少年均具有较高的自尊,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的自尊的影响不显著,然而,网络受欺凌会显著削弱低亲子沟通青少年的自尊<sup>[21]</sup>。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推测,亲子沟通可显著缓冲/削弱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NSSI、抑郁的不利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2:亲子沟通显著调节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以及研究假设3:亲子沟通显著调节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具体而言,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抑郁的关系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显著强于高亲子沟通青少年。

亲子沟通可能也可调节抑郁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良好的亲子沟通不仅有利于父母及时发现孩子的抑郁情绪,也有利于子女更多地感知父母的关心与支持,从而可能有助于缓解抑郁情绪对青少年NSSI的风险效应。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亲子沟通可显著调节抑郁对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如Hong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可以显著缓冲抑郁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即相较于低亲子沟通的青少年,高亲子沟通的青少年在经历抑郁时表现出更低的自杀意念。此外,亲子沟通有利于减少青少年的反刍<sup>[22]</sup>。Hilt等人研究发现,反刍显著调节抑郁与青少年女生NSSI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低反刍女生均表现出低NSSI风险,抑郁对其NSSI的影响不显著,然而,抑郁会显著增加高反刍女生NSSI风险<sup>[23]</sup>。综上所述,亲子沟通可能是缓冲/削弱青少年抑郁对其NSSI风险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4:亲子沟通显著调节青少年抑郁与其NSSI的关系;具体而言,抑郁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显著强于高亲子沟通青少年。

总之,本研究整合体验回避模型与风险—缓冲假说,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从抑郁和亲子沟通视角探讨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拟主要考察:(1)抑郁是否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2)亲子沟通是否调节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3)亲子沟通是否调节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4)亲子沟通是否调节青少年抑郁与其NSSI的关系。上述研究问题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重要的环境因素(网络受欺凌和亲子沟通)、个体因素(抑郁),从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交互作用视角探究青少年NSSI的影响因素,更能反映青少年的生活实际。本研究设计有助于回答网络受欺凌是如何影响青少年NSSI的(中介路径),以及这一作用何时更强或更弱(调节路径)。图1直观地呈现了本研究的假设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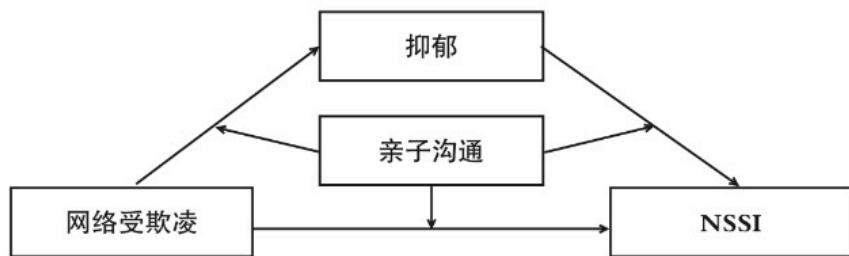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 三、研究方法

####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分别选取广州市、东莞市和中山市3所普通公办初级中学的966名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467人,女生499人,全体被试年龄范围介于11至16岁,平均年龄为12.72岁,标准差为0.74岁。

#### (二)研究工具

1.网络受欺凌。采用网络受欺凌量表对青少年网络受欺凌进行测量<sup>[24]</sup>。要求青少年报告在过去的6个月里遭受网络欺凌的频率。共18个题目,例题如:“有人发送匿名短信威胁、恐吓

我”。采用4点评分,1表示从不,4表示大于等于6次。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得分越高表示该被试遭受网络欺凌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2。

2.抑郁。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青少年抑郁进行测量<sup>[25]</sup>。要求青少年报告在最近一周内的抑郁频率。共20个题目,例题如:“我认为我的生活一无是处”。采用4点评分,1表示偶尔或无,4表示多数时间或持续。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该被试抑郁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9。

3.NSSI。采用非自杀性自伤量表对青少年NSSI进行测量<sup>[26]</sup>。要求青少年报告在过去的6个月里是否曾有割伤自己、烧伤自己等自伤行为。共7个题目,采用4点评分,1表示从不,4表示六次或以上。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该被试NSSI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2。

4.亲子沟通。采用亲子沟通量表对亲子沟通进行测量<sup>[27]</sup>。要求被试报告在过去的6个月里与父母在日常生活、学习、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沟通频率。共10个题目,采用3点评分,1表示从不,3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该被试与父母的沟通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1。

5.控制变量。鉴于冲动性与青少年NSSI的显著关联,本研究将冲动性纳入作为控制变量<sup>[28]</sup>。采用UPPS-P冲动行为量表对青少年的冲动性进行测量<sup>[29]</sup>。共20个项目,要求被试报告在过去的6个月里在预谋、感觉寻求、紧迫感、毅力等方面的表现。采用4点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4表示完全同意。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该被试的冲动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2。

### (三)施测过程和数据处理

在征得作者所在学校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后,以及被试本人及教师、家长的知情同意后,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问卷填答采用无记名方式。问卷完成约需30分钟,被试填答完成后当场收回。采用SPSS 20.0进行数据处理。采用Bootstrap方法( $N = 1000$ )计算偏差校正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来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sup>[30]</sup>。

## 四、数据处理与分析

###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共有7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1个因子的解释量占比为17.26%,小于临界标准40%<sup>[31]</sup>。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 (二)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1呈现了本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矩阵。研究发现:(1)网络受欺凌与抑郁、NSSI均呈显著正相关;(2)抑郁与NSSI显著正相关;(3)亲子沟通与抑郁、NSSI均呈显著负相关;(4)性别与抑郁显著负相关,冲动性与抑郁、NSSI均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1.性别	1.00						
2.年龄	0.06	1.00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6	7
3.冲动性	0.01	-0.09**	1.00				
4.网络受欺凌	0.01	0.01	0.21**	1.00			
5.亲子沟通	-0.03	-0.12**	-0.29**	-0.14**	1.00		
6.抑郁	-0.15**	0.05	0.47**	0.28**	-0.45**	1.00	
7.NSSI	-0.04	0.03	0.19**	0.21**	-0.18**	0.39**	1.00
Mean	—	12.72	2.12	1.13	2.26	1.71	1.07
SD	—	0.74	0.40	0.20	0.53	0.49	0.22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1=男生,0=女生;SD = 标准差;\*p < 0.05,\*\*p < 0.01;下同。

### (三)亲子沟通对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Hayes提出的PROCESS for SPSS的Model 1对亲子沟通在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sup>[32]</sup>。鉴于性别、冲动性与NSSI的显著相关,本研究将其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此外,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如表2所示,网络受欺凌与亲子沟通对青少年NSSI的交互效应显著( $\beta = -0.07$ ,  $SE = 0.03$ ,  $t = -2.47$ ,  $p < 0.05$ ,  $95\% CI = [-0.12, -0.01]$ )。

表2 亲子沟通在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检验

	效标:NSSI			
	$\beta$	SE	t	95% CI
性别	-0.08	0.06	-1.26	[-0.20, 0.04]
冲动性	0.13	0.03	3.99**	[0.07, 0.20]
网络受欺凌 X	0.13	0.03	3.91**	[0.07, 0.20]
亲子沟通 MO	-0.12	0.03	-3.83**	[-0.19, -0.06]
X × MO	-0.07	0.03	-2.47*	[-0.12, -0.01]
R <sup>2</sup>	0.09			
F	18.75**			

为更清楚地解释网络受欺凌与亲子沟通对NSSI的显著的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计算出当亲子沟通为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时,网络受欺凌对NSSI的效应值,并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网络受欺凌和亲子沟通的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去绘制一个简单效应的分析图。如图2所示,结果发现:(1)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网络受欺凌与NSSI显著正向关联( $\beta = 0.20$ ,  $SE = 0.04$ ,  $t = 5.79$ ,  $p < 0.01$ ,  $95\% CI = [0.13, 0.27]$ );(2)在高亲子沟通青少年中,网络受欺凌与NSSI的关联不显著( $\beta = 0.06$ ,  $SE = 0.05$ ,  $t = 1.25$ ,  $p > 0.05$ ,  $95\% CI = [-0.04, 0.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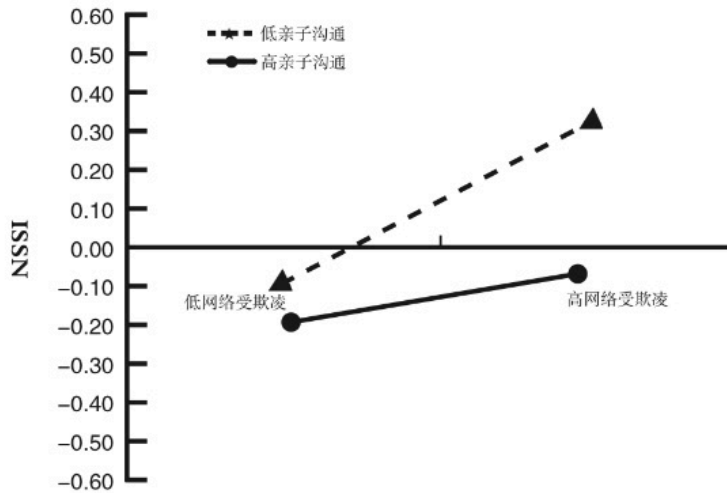


图2 亲子沟通在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 (四)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Hayes(2013)提出的PROCESS for SPSS的Model 59对抑郁在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这一中介路径是否受亲子沟通的调节进行检验<sup>[33]</sup>。本研究将性别、冲动性纳入控制变量进行处理。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如表3所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1)在方程1中,网络受欺凌( $\beta = 0.17, SE = 0.03, t = 5.89, p < 0.01, 95\% CI = [0.11, 0.22]$ )和亲子沟通( $\beta = -0.33, SE = 0.03, t = -12.23, p < 0.01, 95\% CI = [-0.38, -0.27]$ )均可显著预测抑郁,然而,网络受欺凌与亲子沟通对抑郁的交互影响不显著( $\beta = 0.001, SE = 0.02, t = 0.04, p > 0.05, 95\% CI = [-0.04, 0.05]$ );(2)在方程2中,抑郁显著预测NSSI( $\beta = 0.32, SE = 0.04, t = 8.38, p < 0.01, 95\% CI = [0.25, 0.40]$ );此外,抑郁与亲子沟通显著交互影响NSSI( $\beta = -0.09, SE = 0.03, t = -2.96, p < 0.01, 95\% CI = [-0.15, -0.03]$ )。

表3 亲子沟通的调节效应检验

	方程1 效标:抑郁				方程2 效标:NSSI			
	$\beta$	SE	t	95% CI	$\beta$	SE	t	95% CI
性别	-0.33	0.05	-6.41**	[-0.43, -0.23]	0.05	0.06	0.78	[-0.07, 0.16]
冲动性	0.34	0.03	12.54**	[0.29, 0.39]	0.02	0.03	0.72	[-0.04, 0.09]
网络受欺凌 X	0.17	0.03	5.89**	[0.11, 0.22]	0.08	0.03	2.43*	[0.02, 0.15]
亲子沟通 MO	-0.33	0.03	-12.23**	[-0.38, -0.27]	-0.003	0.03	-0.09	[-0.07, 0.06]
X × MO	0.001	0.02	0.04	[-0.04, 0.05]	-0.05	0.03	-1.84	[-0.10, 0.003]
抑郁 ME					0.32	0.04	8.38**	[0.25, 0.40]
ME × MO					-0.09	0.03	-2.96**	[-0.15, -0.03]
R <sup>2</sup>			0.38				0.18	
F			116.02**				29.18**	

为更清楚地解释抑郁与亲子沟通对NSSI的显著的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进一步开展了简单斜率检验。计算出当亲子沟通为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时,抑郁对NSSI的效应值,并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抑郁和亲子沟通的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去绘制一个简单效应的分析

图。如图3所示,结果发现,抑郁与NSSI的正向关联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 $\beta = 0.41$ ,  $SE = 0.04$ ,  $t = 9.90$ ,  $p < 0.01$ ,  $95\% CI = [0.33, 0.49]$ )显著强于高亲子沟通青少年( $\beta = 0.24$ ,  $SE = 0.06$ ,  $t = 4.29$ ,  $p < 0.01$ ,  $95\% CI = [0.13, 0.34]$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计算偏差修正置信区间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发现,网络受欺凌通过增加抑郁,进而增加NSSI的中介效应在低亲子沟通青少年中(中介效应值为0.07,  $SE = 0.02$ ,  $95\% CI = [0.03, 0.12]$ )显著强于高亲子沟通青少年(中介效应值为0.04,  $SE = 0.02$ ,  $95\% CI = [0.01, 0.08]$ )。因此,中介路径“网络受欺凌 → 抑郁 → NSSI”受亲子沟通的调节,即形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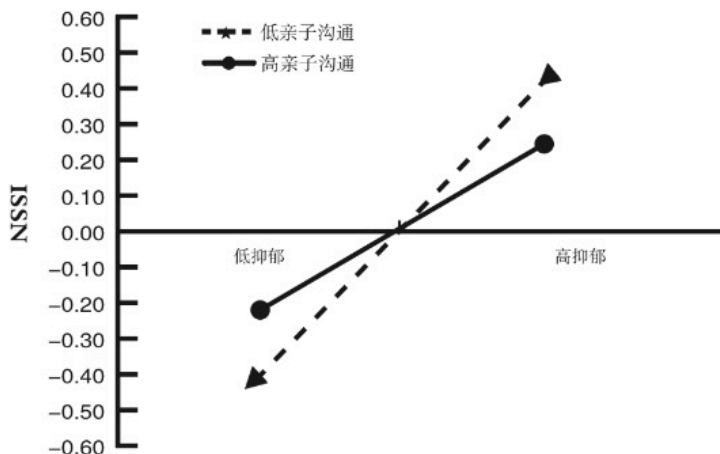


图3 亲子沟通在抑郁与青少年NSSI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 五、讨论与分析

### (一)抑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抑郁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之间的关系。这与研究假设1相一致,表明抑郁是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过程。换句话说,一定程度上,网络受欺凌是通过增加青少年的抑郁,进而增加其NSSI风险。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遭受网络欺凌的频率和程度都呈日益增加之势。相较于线下的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因其隐蔽性、匿名性而侵害程度更为强烈,且因长时间停留在网络上无法消除而造成持续伤害。因此,网络受欺凌往往是强烈而持久的重大压力事件,直接造成较高强度的抑郁。此外,网络受欺凌的危害的持久性会使得青少年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如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他人是有敌意的等),进而导致抑郁等消极情绪<sup>[34]</sup>。进一步地,依据体验回避模型,青少年往往会选择NSSI作为回避抑郁情绪的应对方式,从而出现NSSI风险<sup>[35]</sup>。何灿等人研究也发现,压力下的抑郁情绪反应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关系<sup>[36]</sup>。本研究建设性地拓展了何灿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抑郁是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重要中介“桥梁”。

### (二)亲子沟通的调节作用

与研究假设2相一致,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显著调节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NSSI的关系。具体而言,遭遇高网络受欺凌只会显著增加低亲子沟通青少年的NSSI风险,而高亲子沟通可以强有力地削减高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NSSI的风险效应。本研究结果建设性地验证了风险—缓冲假说,表明网络受欺凌并不会导致所有青少年出现NSSI风险,其作用因亲子沟通这一保护性因素水平的不同而不同<sup>[37]</sup>。

与研究假设3不一致,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在网络受欺凌与青少年抑郁关系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匿名性强的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过于快速而强劲,亲子沟通来不及缓解/削弱其风险效应。也可能是因为,网络受欺凌具有隐秘性,不易被父母所发现。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究能有效削减网络受欺凌导致青少年抑郁等消极情绪的重要保护性因素。

与研究假设4相一致,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显著调节抑郁与青少年NSSI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具有高隐蔽性的网络受欺凌而言,抑郁更易被父母所发现。因此,高亲子沟通的状态下,父母能及时了解青少年的情况,进而为处于抑郁状态的青少年提供情感支持以及应对策略,从而减少了NSSI风险。与此相反,低水平亲子沟通则会放大抑郁对青少年NSSI的风险效应。具体而言,一方面,青少年处于抑郁状态时,会感受到更多的心理痛苦和麻木,而不良的亲子沟通会使之加剧。另一方面,低水平的亲子沟通可能表现为青少年与父母更频繁、激烈的争吵,随之产生孤独感和愤怒情绪。为舒缓内心的痛苦、麻木、孤独感,以及宣泄自己的愤怒情绪,青少年更可能出现NSSI。因此,本研究发现强调了高亲子沟通是削减抑郁对青少年NSSI的风险效应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此外,综合对研究假设2、3、4的检验,可以推断亲子沟通对网络受欺凌所引起的青少年NSSI风险效应起着重要的保护性作用,而这一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调控由网络受欺凌所引起的抑郁情绪对青少年NSSI的风险效应。

### (三)教育上的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预防和干预青少年NSSI实践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网络受欺凌显著增加青少年的NSSI行为。这提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青少年网络受欺凌的影响,尽早识别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并通过干预手段,减少被侵害学生的消极情绪,避免引发NSSI,引导受侵害学生采取正确、灵活的方式来应对网络欺凌。其次,抑郁在网络受欺凌和NSSI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提示学校和父母应积极关注学生的情绪状态。学校可以通过创建校园活动(开展讲座、心理辅导活动等),指导学生掌握积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帮助学生及时排解抑郁情绪;父母则可以发挥榜样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情绪管理和调节能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最后,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可以调节网络受欺凌、抑郁与NSSI的关系。这提示父母应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构造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实现良性的亲子沟通,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情感支持和正确的情绪归因辅导,提高孩子处理网络受欺凌和抑郁情绪的能力。同时,在开发和实施青少年NSSI干预方案时,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亲子沟通对青少年NSSI的影响。

###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本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推论受到一定的局限。具体而言,网络受欺凌、抑郁与NSSI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因果。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考虑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设计,进一步厘清本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二,本研究仅探究了抑郁在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究其他情绪(如焦虑、绝望等)或心理社会过程(如自尊、情绪安全感等)是否显著中介网络受欺凌对青少年NSSI的影响。其三,本研究仅探究了亲子沟通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课可进一步探究家庭其他因素(如家庭功能、亲子关系等)或其他环境因素(如学校氛围)或个体因素(如自我控制)在网络受欺凌影响青少年NSSI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 [ 参 考 文 献 ]

- [1] [6] Nock M K. Self - injury,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0, (1).  
[2] [8] [16] Zhu J, Chen Y, Su B, et al. Anxiety Symptoms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Cybervictimization on Adolescent Non - Suicidal Self - Injur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 - Control,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1, (4).



- [3] 喻承甫 邓玉婷 等:《非自杀性自伤的认知神经与遗传学机制》,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 [4] John A, Glendenning A C, Marchant A, et al. Self – Harm, Suicidal Behaviours, and Cyberbullying i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8, (4).
- [5] Mason K L. Cyberbullying: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for School Personnel,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8, (4).
- [7][28] Yu C, Xie Q, Lin S, et al.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Non – Suicidal Self – Injurious Behavio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School Engagement as a Mediator and Sensation Seeking as a Moderator,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0, (11).
- [9] Lo C C, Howell R J, Cheng T C. Explaining Black – White Differences in Homicide Victimization.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3, (1).
- [10][34] Cole D A, Zelkowitz R L, Nick E, et al. Longitudinal and Incremental Relation of Cybervictimization to Negative Self – Cognition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6, (7).
- [11] Chu X W, Fan C Y, Liu Q Q, et al.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xamining Hopelessness as a Mediator and Self – Compassion as a Moderat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8, (9).
- [12] Liu S, You J, Ying J, et al. Emotion Reactivity, Nonsuicidal Self – Injury,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uicide Ideat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4).
- [13][35] Chapman A L, Gratz K L, Brown M Z.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 – 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6, (3).
- [14] Marshall S K, Tilton – Weaver L C, Stattin H. Non – Suicidal Self – Injur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Middle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3, (8).
- [15] Baiden P, Stewart S L, Fallon B.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Non – Suicidal Self – Injury among Adolescents: Findings from Community and Inpatient Mental Health Settings in Ontario, Canada, *Psychiatry Research*, 2017, (9).
- [17][37] Luthar S S, Grossman E J, Small P J. Resilience and Adversity,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cience* (7th ed), 2015, pp.247 – 286.
- [18] 茹福霞 杨丽霞 等:《中学生亲子依恋及其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载《中国学校卫生》,2018年第5期。
- [19] Wang Q, Liu X, Peer Victimiz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 – Injury Among Chinese Left – Behind Childre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20, (1).
- [20][23] Hilt L M, Cha C B, Nolen – Hoeksema S. Nonsuicidal Self – Injury in Young Adolescent Girls: Moderators of the Distress – Functio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8, (1).
- [21] Özdemir Y. Cyber Victimization and Adolescent Self – Esteem: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4, (4).
- [22] Hong N. Influence of Peer Victimization on the Adolescent’s Suicidal Ideation: Testing the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s of Depression through Parent – 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2).
- [24] Erdur – Baker Ö. Cyberbullying and Its Correlation to Traditional Bullying, Gender and Frequent and Risky Usage of Internet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Tools,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1).
- [25] Radloff L S. The CES – D Scale: A Self – 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 (3).
- [26] You J, Lin M P, Fu K, et al. The Best Friend and Friendship Group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 – Injur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3, (6).
- [27] Su S, Li X, Lin D, et 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The Role of Parental Migration and Parent – Child Communication,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3, (2).
- [29] Cyders M A, Littlefield A K, Coffey S, et al. Examination of a Short English Version of the UPPS – P Impulsive Behavior Scale, *Addictive Behaviors*, 2014, (9).
- [30] Mackinnon D P.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McGraw – Hill, 2008, pp.313 – 331.
- [31] 周 浩 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6期。
- [32][33] Hayes A F. Model Templates for PROCESS for SPSS and SAS, 2013.
- [36] 何 灿 魏 华 等:《网络被欺负对青少年自伤的影响:抑郁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效应》,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 彦)